

文化遗产保护的可贵探索

王福州

开栏的话

今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对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本版开设“传承之光”栏目,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含的文化血脉,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坚定文化自信。

从2001年5月18日昆曲艺术名列世界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始计,中国非遗保护事业走过20年非凡历程。目前,中国有42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成为缔约国中代表作和保护实践示范项目最多的国家。围绕这些保护实践形成的中国经验广受赞誉。

从单个项目到整体性保护 中国经验值得总结推广

20年来,非遗“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理念不断强化,保护方式不断创新,传承制度不断完善,因之形成的中国经验值得总结与推广。

其一,对具体项目实施分层次、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

对失去生存条件或面临传承困境的项目展开抢救性保护。比如中国纺织史活化石之一的黎锦,曾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急需保护名录”。我们在科学施救时,通过建立黎锦技艺传承村、传承馆和生产性保护



①

示范基地以及推进黎锦技艺进校园等,重点解决了天然染料、染料匮乏和人才短缺问题。经过10余年的保护实践,目前已有上万人掌握黎锦制作技艺,黎锦成为“急需保护名录”67个项目中最显著改善濒危状况的项目之一。

黎锦的成功脱危,不仅是中国非遗保护实践的一个缩影,也履行了对世界的庄严承诺。2015年启动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2017年实施的“国家级非遗项目记录工程”,通过数字网络信息技术,将一批代表性传承人所承载的独门技艺和文化记忆记录下来。

遵循非遗自身演变规律,对部分项目施行“生产性保护”。非遗不是静态的、凝固的,尤其是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医药药物炮制类和饮食文化类等项目,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直在传承和演变。文化和旅游部先后公布了两批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合计100个,设立了15个传统工艺工作站,对14个门类、383个传统工艺项目予以重点支持。如贵州苗族蜡染一度面临传承危机,在“生产性保护”中面向市场转型,激发出传承发展的内生动力。

其二,依托文化生态区推进整体性保护。非遗及其得以孕育、发展的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在保护中维护文化多样性,保护文化生态空间的完整性和文化资源的丰富性,这是我国非遗工作的重大创造。以2007年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设立为起点,至2020年,全国已有23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实验区)。“十四五”期间还将再增7个。将文化生态保护区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进行有效衔接。从2017年首次提出“国家文化公园”概念,到“十四五”期间高质量推进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文化遗产保护已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

其三,“融合”成为当下非遗作为文化资源的常态。非遗深度融入文旅融合,以非遗体验为主题的休闲、体验、研学游,塑造了人们心中的“诗和远方”。非遗搭上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快车,社交网络和电商平台成为非遗产业重要的传播和交易平台。仅以短视频平台抖音的数据为例,早在两年前,1372个国家级非遗项目中就有1214个在抖音上有所呈现,覆盖率超过88%。非遗保护成为影响深远的公共文化事业,动员了千百万公众参与,逐步融入美丽中国、生态文明、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方面。比如在助力精准扶贫过程中,文化和旅游部与原国务院扶贫办共



②

同确定了10个“非遗+扶贫”重点支持地区,截至2020年底,国家级贫困县建成非遗扶贫就业工坊近1000家。

其四,非遗保护以“人”为中心。中国非遗工作20年的实践,形成了代表性传承人名录体系,探索建立了传承人评估机制,大力开展对传承人群的研修培训。其中,“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很有代表性。各木偶剧团到大小中学校开办“木偶戏兴趣小组”,组织“校园木偶节”,建设木偶戏传习所,在传统师徒传承的基础上,建立以剧团带培训班、与高等院校合作办学等人才培养模式,该计划因此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遗“优秀实践名册”。

从实践探索到理论建构 彰显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性

随着保护实践的深入,人们对非遗的认知也在不断深化。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强非遗的保护和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非遗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是时代赋予非遗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首先,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体系。20年来,中国始终遵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操作形制,取得了令缔约国刮目相看的成绩。但《公约》对非遗体系的构建包括概念、定义和分类等,更多反映了西方文化特性和理念,重点着眼不同社会群体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关注“外化于行”层面的知识和提炼,而缺少“内化于心”层面的概括。这导致一些观念、伦理、礼仪等类别的精神性遗产难以纳入非遗名录,如中国人祭天文、观星象、利用地磁和星术进行占卜预测的体系等,大量充满中华智慧的文化创造被疏漏了。我们应努力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体系,依照中华文化自身的特点来分类、描述、阐释和宣传,彰显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性。

其次,着力加强非遗基础理论研究。一项事业想要长远持续发展,离不开理论的支持。非遗保护经过20年的行动实践,在普查、建档、研究、保护、传承和振兴等具体环节,累积了无数经验,也遇到很多问题,需要



③

系统地沉淀、总结和思考。关于非遗的理论研究,不仅涉及其本体、价值、形态、发展规律等自身的基本问题,也离不开考古学、文物保护与修复、博物馆学等学科。当前“大遗产观”视域下正在推进的“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可以说标志着非遗保护即将进入新阶段。部分高校已开始招收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方向的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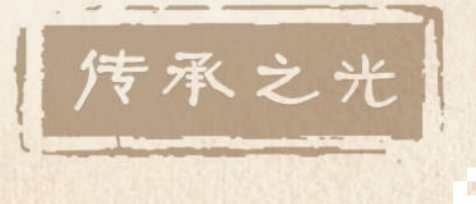
多样性是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基石。非遗体现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的认知体系、价值观念和表述方式,观念的交融使遗产的概念和分类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不难预见,这种变化将持续存在。如何适应变化、参与变化甚至引领变化,以文化遗产的“中国范式”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独具的传统智慧,非遗保护工作者大有可为。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图①:传承人在“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展区表演。
图②:黎锦传统纺织染织技艺中独特的拼染技艺。
图③:贵州苗族蜡染传承人走进扶贫工坊示范指导点蜡作画。

周奇摄
周奇摄
新华社发

版式设计:赵德汝



史家笔墨

历史学与考古学融合发展,不是合二为一,而是一种交互模式、辩证关系,共同促进和培育新的学科生长点,为更好地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做出贡献

推进历史学与考古学融合发展

卜宪群

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学离不开考古学的坚强支撑。我国古代有悠久的历史学传统,但没有近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唐宋以后产生了金石学,有人将其视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但实际上二者有本质区别,金石学在推动古代史学发展的动力和能力上是有限的。我国近代意义上的考古学是20世纪20年代后才开始形成。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几代考古工作者筚路蓝缕,开辟了我国考古事业的辉煌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些成绩不仅表现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琳琅满目的考古发现上,也表现在考古学揭示中国境内远古人类起源、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以及补史、证史、纠正历史记载错误等诸多方面。

历史学离不开考古学的支撑,这是100多年来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考古学巨大成绩的客观反映。20世纪上半叶史学大家王国维、陈寅恪等,对“地下之新材料”和“地下之实物”的重视,推动了史学方法论(二重证据法)和新的史学问题意识产生,影响十分深远。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度有限,更多的是没有文字时期。走出神话传说,用实物资料构建人类的早期历史,没有考古学是不可能完成的。如今,通过考古学家的努力,历史学已经可以根据考古材料,对我国境内人类起源与区域发展演变有一个初步描述。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成绩同样斐然,其发现在揭示农业起源、社会复杂化、文明与国家起源等诸多领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新石器时代考古实践,使我国历史学有可能走出传说时代,构建起中国特色的文明与国家起源理论,而这对阐释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发展道路具有重大意义,是以往历史学想做但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即使是文字记载后的历史,考古材料仍然是历史学家认识该时期历史的重要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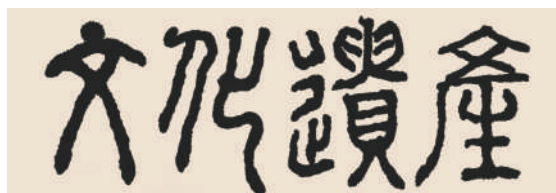
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同样离不开历史学的坚强支撑。考古学要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新探索历史发展规律,要为认识中华文明、弘扬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这个功能,显然不是考古学可以独立完成的,必须与历史学相结合。通过历史学的方法,将考古学所揭示的人类活动遗迹,纳入历史研究与历史书写的范畴中来。

百年来,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自信,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比如,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许多重大考古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认识,极大地促进了对史前文化发展整体格局和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各地区互动关系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区系类型”“重瓣花朵”“相互作用圈”“多元一体”等多种模式。这其中如果没有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没有历史学家长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与实践探讨,也是不可能的。又如,秦汉时期,历史学对大量简牍文书、皇宫遗址、皇室贵族墓葬等考古发现的解读研究,有力支撑了这些考古发现的重大意义与价值。不能设想离开秦汉考古的秦汉史研究,也不能设想离开秦汉史研究的秦汉考古学。

历史学要充分利用借鉴考古学的成果,运用丰富的考古材料,在阐释中国特色历史发展道路,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上发挥作用。考古学要充分利用借鉴历史学成果,运用历史学理论与实践,推进考古学在解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思想意识发展演变上的作用。要从话语体系上推进历史学与考古学的融合。历史学与考古学学科体系有别,在话语体系上当然也有差异。比如“聚落”“村落”这些词,在考古学上和历史学上的含义就不尽相同。如何从大量无文字的历史遗迹中归纳总结出概念,从中观察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考古学也需要向历史学学习,将考古成果科学转化为历史学的表达话语。

显然,历史学与考古学融合发展,不是合二为一,而是一种交互模式、辩证关系,共同促进和培育新的学科生长点,为更好地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做出贡献。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



张忠炜供图

里耶秦简二十年

张忠炜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地处湘鄂渝三省交界区,因里耶古城及里耶秦简的发现而闻名于世。里耶古城、秦简是“基建考古”的产物——为配合碗米坡水电站的兴建而进行的抢救性考古发掘。

2002年6月3日9时许,在酉水河边以小孔径筛淘洗古井中出土的填充物时,考古工作者发现一块木片上有奇怪的墨迹,后被释读为“布四寻……”,第一枚里耶简就这样面世了。

时任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袁家荣当即决定,暂缓发掘工作,搭建工棚,重新调整安排里耶古城遗址和一号井的发掘工作。至6月27日,一号井的发掘工作完成。

发掘过程尤为艰辛,主持参与发掘的考古工作者张春龙、龙京沙写道:“井下工作相当艰苦,阴暗潮湿,空气污染,蚊虫肆虐。可能是由于缺氧,打火机打着不着火。而赖以照明的白炽灯在异常的空气压力下经常炸裂。后来添了一个小小的鼓风机,井下的通风环境才稍有改善。”

张春龙还写道:“工期紧张,骤降大雨,酉水涨落,江面不时超出井中的操作面,时刻面临塌方的危险。”“恐怕损坏文物,不曾探明深度,越往下越是危机重重。虽然尽可能采取措施保证安全,架设撑架,但身处狭窄的井下,我们不免心中惶恐。”

人工逐层“以手为铲”的清理法,即便是十几年后,龙京沙依旧记忆犹新,“用手抠了将近几十立方米的淤泥,可以说创造了我国古井发掘的一个奇迹”。



④

⑤

参与里耶一号井发掘的成员近30人,除文物工作者之外,有不少都是当地乡民,而今已有几位过世。作为考古队的重要组成部分,质朴乡亲们的默默付出,局外人几乎是看不到的。

3.7万余枚的简牍资料(含无字残简),对考古工作者而言,意义不言而喻。从秦人占领到统一的迅速瓦解,迁陵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里耶简是历史的记录者。“秦政法”由此清晰呈现。

南方墓葬中出土的丧葬简牍,已在地下水中浸泡了2000年左右。井窖中出土的主要是

作为废弃物的垃圾筒,或经火焚,或被销毁,加之长久埋藏于潮湿、肮脏的地底下,出土时多已朽断。稍加清洗,墨迹多会清晰呈现,与空气、阳光短暂接触后,它们很快就会发黑,墨迹逐渐变得模糊。

保护工作迫在眉睫。以方北松为代表的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团队,不仅是国内出土漆木器、纺织品保护的重要力量,也是简牍文物脱水保护的重要力量。在陈中行、吴顺清等老一辈文物人发明、沿用漆木器脱水方法的基础上,方北松反复实验,终于在简牍脱水脱

色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所谓脱水,是用化学物质将处于饱水状态的竹筒纤维和细胞里面的水置换掉,用化学物质将竹筒稳定支撑起来。所谓脱色,是让竹筒还原和呈现本来颜色,让字迹清晰可辨。这是目前国内简牍保护的重要方法之一。然而,里耶简多为木简,竹筒的脱色方法并不完全适用,只能在实验中继续摸索。如今,经过脱水脱色保护之后的里耶简,几乎再现了2000多年前的原貌,这是文博工作者辛苦付出的结果。

在对简牍进行脱水脱色保护之前,工作人员会采集红外、彩色影像,这是开展文字释读的基础。里耶简的释读初稿由张春龙完成,先秦汉史研究专家吴荣曾、古文字学家李家浩等指导了整理工作。这是一份艰苦的工作,从《里耶秦简(叁)》开始,张春龙组织释文审订会,力争拿出一份尽可能少出错的释文。在这个过程中,张春龙观察到里耶简的刻齿与简文所见的数字存在对应关系,并将刻齿现象记录在相关简牍释文之后,引来中外学者对里耶简刻齿进行全面调查与研究。其研究成果,无疑是近年来秦汉史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里耶秦简的发掘者、保护者与整理者一直以质朴踏实的态度默默付出。如今,在里耶古城及秦简发掘近20周年之际,《里耶秦简研究论文集》出版,这是对所有参与者辛勤奉献的一种肯定。

图④:里耶简脱水脱色之前和之后对比。

图⑤:里耶一号井第八层出土的刻齿简。

张忠炜供图